

〔清〕葉燮 著 蔣寅 箋注

原詩箋注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要籍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7.227.49
06

014037438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要籍叢書

原詩箋注

〔清〕葉燮 著
蔣寅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航

C1725778

I207.227.49
0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原詩箋注 / (清)葉燮著;蔣寅箋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4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要籍叢書)

ISBN 978-7-5325-7075-1

I. ①原… II. ①葉… ②蔣… III. ①詩話—中國—
清代②《原詩》—注釋 IV. ①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34385 號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要籍叢書

原詩箋注

[清]葉燮著

蔣寅箋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鐵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0.25 插頁 3 字數 330,000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978-7-5325-7075-1

I·2766 定價: 68.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前言

葉燮《原詩》不用說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歷來論者無不贊賞它理論意識鮮明、詩史視野開闊、現實針對性強、批評眼光犀利且長於論辯的特點。如林雲銘序稱「直抉古今來作詩本領，而痛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沈珩序稱「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之以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語語如雷霆之破睡，可謂精矣神矣」，郭紹虞稱「葉燮論詩之長，在用文學史流變的眼光與方法以批評文學，故對詩之正變與盛衰，能有極透澈的見解」^①，吳宏一稱「它的表現形式，有如一篇完整的論文，嚴謹而有系統，絕非其他的詩話可比擬」^②，呂智敏說「這是我國第一部具有較為嚴密的邏輯體系，集中論述詩源、詩美、詩法的詩學專著」^③。近年，以葉燮《原詩》為研究

① 郭紹虞《清詩話·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三頁。

② 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一六〇頁。

③ 呂智敏《詩源·詩美·詩法探幽》——《原詩》評釋《前言》，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對象的學術專著層出不窮^①，顯示出它的理論價值愈益受到學者的重視。這不僅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也體現了新的學術語境下對中國古典詩學及詩歌批評重新加以認識和反思的時代要求。

葉燮原名世倌，字星期，後改名燮，號已畦。寓居橫山講學，世稱橫山先生。先世爲浙江嘉善人，占籍江南吳江（今屬江蘇）。明天啓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一六二七年十

① 丁履撰《葉燮的人格與風格》，臺灣成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蔣凡《葉燮和〈原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葛惠璋《〈原詩〉與〈一瓢詩話〉之比較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楊暉《古代詩路之辯——〈原詩〉和正變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董就雄《葉燮與嶺南三家詩論比較研究》，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版。未出版的學位論文尚有：陳惠豐《葉燮詩論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一九七七；馮曼倫《葉燮〈原詩〉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一九八二；王策宇《葉燮〈原詩〉析論》，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一九八八；廖宏昌《葉燮文學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一九九二；李興寧《葉燮〈原詩〉論「正變」觀念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一九九九；吳曉佩《薛雪詩學研究——兼論與葉燮、沈德潛詩學理論之關係》，臺灣大學碩士論文，二〇〇〇；簡文志《葉燮、薛雪與沈德潛詩論研究》，佛光大學博士論文，二〇〇五；李曉峰《葉燮〈原詩〉研究》，蘇州大學博士論文，二〇〇六；李鐵青《論葉燮的詩性智慧》，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二〇〇七。

一月六日)生於南京。吳江葉氏是當時天下最負盛望的文學世家之一。葉燮祖重第，明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會元，官貴州提學僉事。父紹袁，號天寥道人。明天啓五年(一六二五)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以母年高棄官歸養。著書十餘部，傳世有《葉天寥四種》。母沈宜修，字宛君，副都御史沈琬女，劇作家沈璟侄女，兄弟輩悉有文名，工詩，有《鸚吹集》。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歸葉紹袁，育有五女八男，俱有文才。長女紉紉，歸父同年袁儼之子，有《愁言集》。次女小紉，字蕙綢，歸沈璟孫永楨，有《存餘草》、《鴛鴦夢傳奇》。三女小鸞，字瓊章，字崑山張立平，未及嫁而卒，有《返生香集》。次男世偁，三男世俗，皆早逝，世偁有《百旻草》，世俗有《靈護集》。一門詩文，後人彙編爲《午夢堂集》，盛傳於世。

葉燮自幼穎慧，四歲時父授以《楚辭》，即能成誦。九歲，母歿，父課以詩文，隨諸兄讀書。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於嘉善應童子試，名列第一，補縣學生。翌年，娶王子亮女。四年(一六四七)六月，與長兄世佺隨父至平湖，寓從舅馮洪業別墅耘廬，補嘉興府學生員。次年父卒，留館於馮氏，一度客於名詩人宋琬寧紹台道參政幕中。康熙五年(一六六六)秋，中浙江鄉試舉人。九年(一六七〇)與徐乾學、李光地中同榜進士。

十四年（一六七五）謁選，授揚州寶應知縣，六月上任。居官僅年餘，便以不附上官，於翌年十一月罷歸。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冬，在蘇州城西南橫山西麓購得廢圃，修築二棄草堂，課徒講學，遠近學者瞻雲就日，望風景從。

當時吳中著名文士汪琬也在堯峰講學，門徒數百人。汪琬爲人，狷急好辯，又夙與葉燮持論枘鑿，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也各持師說不相下。葉燮摘汪琬文集中瑕疵，撰爲《汪文摘謬》一卷。其中部分內容與《原詩》相出入，研究者因而認爲《原詩》即針對汪琬而發^②。迨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冬，汪琬下世，葉燮聞訃，黯然道：「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俾平心靜氣，以歸於中正之道，非爲汪氏學竟謬盤聖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失一諍友矣！」（沈德潛《葉先生傳》，《歸愚文鈔》卷一〇）乃盡焚其稿。此書日後復傳於世，很可能出自親故所藏副本。葉燮晚年生計頗窘，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春，曾一度客揚州賣文。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他將所著《已畦集》並及門數子詩寄給王士禛。九月間王有復函，極稱其詩古

② 鄒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八六—二八八頁；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冊第二六五頁。

文能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并贊許門下士沈德潛等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而葉燮已在秋間病故，不及見王士禛此札。九泉有知，他應爲畢生詩文終得當世文壇盟主蓋棺論定而欣慰。

葉燮學行宗宋人，講理學，兼通佛老，工詩文，對創作、批評與自己的才能有清楚的意識。沈德潛《葉先生傳》載其語弟子曰：「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吊，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肯多讓。」沈氏又云：「先生論詩，一曰生，一曰新，一曰深，凡一切庸熟、陳舊、浮淺語須掃而空之。今觀其集中諸作，意必鉤玄，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戛戛於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①關於葉燮的思想傾向和文學創作成就，蔣凡先生《葉燮和〈原詩〉》一書已有全面論述，讀者可以參看。這裏可以補充的是，葉燮不僅在詩文創作、批評上自成一家，指授後學也多有成就。其門人今可確考者尚有葉長揚、顧嘉譽、張鈺、沈德潛、謝淞洲、沈巖、李果、薛雪、周之奇、陳康世等。葉燮身

① 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卷一〇，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重刊本。

後因位卑而名不甚著，嘉、道以後論詩文者很少提到他。但他的詩學爲沈德潛、薛雪所傳承，對乾隆間詩學產生了直接影響。他的著述今傳有《江南星野辨》一卷、《已畦瑣語》一卷、《已畦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十卷、《殘餘》一卷、《汪文摘謬》一卷、《原詩》四卷，及所參修的吳江、寶應、陳留、儀封諸縣志。曾編有《國朝四家詩集》四卷，今不傳。

二

葉燮自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罷官後，便潛心研究歷代詩文，逐漸形成自己的見解。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春，他求座主張玉書爲游歷南方所作《西南行草》作序，自述爲詩之旨曰：「放廢十載，屏除俗慮，盡發篋衍所藏唐宋元明人詩，探索其源流，考鏡其正變。蓋詩爲心聲，不膠一轍，揆其旨趣，約以三語蔽之，曰情、曰事、曰理。自《雅》《頌》詩人以來，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備而縱其氣之所如，上摩青旻，下窮物象，或笑或啼，或歌或罷，如泉流風激，如霆迅電掣，觸類賦形，騁態極變，以才御氣而法行乎其間，詩之能事畢矣。世之縛律爲法者，才荏而氣繭，徒爲古人傭隸而已，烏足以語此。」（張玉書《已畦詩集序》）這些內容正是《原詩》的核心思想，證以康熙二十三年（一

六八四)五月劉獻廷《葉星期以詩稿見惠步昌黎韻酬贈》詩：「《大雅》不作六義廢，瓣香誰付金縷衫。昨來摳衣入林下，紅日初向東山銜。黃鐘大呂奏東序，高唱不效金人絨。杜陵昌黎君所愛，眉山之外皆除芟。」(《廣陽詩集·七古》)可見葉燮以杜、韓、蘇爲宗的詩觀，當時已爲友人所熟悉。吳宏一推斷《原詩》作於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至二十三年(一六八四)之間^①，大體可從。蔣凡定於張玉書撰《西南行草序》至沈珩撰《原詩叙》的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至十月間^②，也可備一說。

關於《原詩》的寫作背景，有必要在此略加討論。近年周錫鞞據康熙年間葉燮遊粵的經歷，比較他與嶺南三家詩學的相似點，提出葉燮詩學受嶺南三家啓發的推測^③。董就雄更在老師的啓發下詳加考析，從本體觀、發展觀、追求儒學的純正、詩載六經之道、雅爲詩之源與流幾方面，將葉燮與嶺南三家論詩相通之點加以比較^④，給學界帶來

① 吳宏一《葉燮〈原詩〉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六卷二期，一九七七年版。收人氏著《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版，第八四—八八頁。

② 蔣凡《葉燮和〈原詩〉》，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五頁。

③ 周錫鞞《陳恭尹及嶺南詩風研究》，香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二三〇—二三六頁。

④ 董就雄《葉燮與嶺南三家詩論比較研究》，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版。

新的啓發。不過覆案其論考，我覺得兩位學者提出的假說尚可商榷。一則除了梁佩蘭，葉燮與屈大均、陳恭尹的交往還缺乏具體材料證實；二則葉燮詩學近似三家者都屬於當時一般觀念，而葉燮詩學的主導傾向却絕不同於嶺南三家。最重要的分歧，就是葉燮折衷唐宋，主張自成一家（這在當時是很特殊的），而嶺南三家則明顯立足於唐詩派的立場，以致屈大均有「詩之衰，宋、元而極矣」之嘆^①。至於董氏認為「當三家享負盛名時，葉氏仍耽於其『六朝駢麗餽釘藻績』的詩文之習，而且尚未鑽研文學理論。他的《原詩》是在結識梁佩蘭，拜讀并深服其作品，與梁進行過理論探討，又研讀過陳、屈的詩論，并親到嶺南游歷大半年之後，纔返鄉撰成的。……陳恭尹等的觀點要發表、流布在先，且有成功的創作實績相輔而行，故聲名早著；而葉氏《原詩》形成在後，本人詩作成就不高，未副其所論，生前名位亦不顯，故其詩論不見重於當時，於去世後纔稍見影響。……若雙方之理論確曾有受對方影響之處（此一可能性極大），則只能是葉氏受嶺南三家之熏染影響，而不會相反」^②，則與諸人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殊不相符，恐

① 屈大均《翁山詩外》，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三册第六六頁。

② 董就雄《葉燮與嶺南三家詩論比較研究》序，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版，第六頁。

還值得推敲。

事實上葉燮出身名門，交游往來悉爲一時名士，徐嘉炎贈詩稱「文章海內推游子」^{〔一〕}，後講學於橫山，與當時吳中最負盛名的汪琬分庭抗禮，似乎不能說名位不顯。更何況江南是清初的文化中心，四方名士只有登上江南的舞臺才能獲得全國性的聲譽。梁佩蘭（一六二九—一七〇五）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春來游蘇州時，雖係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老解元，但要到徐乾學任主考的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纔中進士，是十二上春官的老舉人，而葉燮却是徐乾學十多年前的進士同年。葉燮《送梁藥亭歸南海》以「梁生」稱佩蘭，已見兩人輩份的懸殊。詩中雖謙稱「我慕今時古人久」，但言及論詩却頗見扞格：「予奪千秋互袒左，予乙李白君力争。」梁佩蘭「早歲之作，尚不脫七子窠臼」，直到晚年入京，「交王士禛、朱彝尊，始參以眉山、劍南」^{〔二〕}，而葉燮夙以杜甫、韓愈、蘇軾三家爲宗，猛烈抨擊明七子輩的僞唐詩，兩人持論之齟齬不合，不難想見。儘管如此，兩人的交往還是很友好的，《已畦詩集》留下五首與梁佩蘭酬贈之作。

〔一〕徐嘉炎《葉星期見過小樓賦別二首》之二，《抱經齋詩集》卷九，康熙刊本。

〔二〕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九八六頁。

而後來葉燮所以有嶺南之游，也應該是出於梁佩蘭的邀請。據常理推之，葉燮遠游嶺南，當擁有較高的文化勢能，他的觀念影響嶺南詩人的可能性要更大。然而事實上，葉燮抵達廣州時，梁佩蘭已北上應試，葉燮滯留羊城近半年，并無會晤陳恭尹和屈大均的記載。董就雄推測葉燮遭到冷遇的原因是他爲官耿直，樹敵太多，尤其是撰《汪文摘謬》，刺激了與汪琬友善的嶺南三子，所以大家都回避他；周錫韜甚至認爲葉燮在當時不太爲時彥所重。這只能說是過於主觀的推測。首先，葉燮在廣州并未受到冷遇，康熙二十四年初他剛抵廣州就有《上兩廣制府吳大司馬》詩，投兩廣總督吳興祚。吳氏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前後任無錫知縣，與吳中文士交往極密。與葉燮南游同時，王士禛奉命祭告南海，老名士余懷附行，便是來廣州投奔吳氏的。四月初王漁洋將還朝，葉燮有《送王阮亭宮詹祭海還朝》詩。五月端午節，葉燮又受鎮海將軍王永譽之邀宴集於湖舫，有《午日王大將軍湖舫宴集同人分限二冬韻》。他在廣州看來備受高層禮遇，如今不見他與陳恭尹、屈大均往來的記載，并不意味着就是受到冷遇。以余懷的遺民身份和文章盛名，廣州文士不會不欣於禮接，可如今我們也不清楚他在廣州的交游，正屬於同樣的情形。文獻流傳有時會有很多偶然的原因。

董著最後得出結論，即便葉燮在廣州未見到嶺南三子，起碼也讀過梁佩蘭詩集，有可能受到屈大均、陳恭尹兩序的影響，並進而推斷凡葉燮觀念與三子接近的，都屬於受後者影響。我覺得他所舉出的相似點，大體是當時詩家的一般觀念。他們身處相同的語境，面對共同的問題，想法自然是很接近的，讀者瀏覽本書「箋」的部分，當不難理解這一點。最主要的是，董著列舉嶺南三子的作品，都未考證寫作年代，一概認為早於葉燮，影響葉燮，終究缺乏說服力。若一個年代有誤，全部結論便岌岌乎危哉。比如講到陳恭尹的名聲，舉趙執信序，說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他「聽聞陳氏詩名已達二十年之久」。按：康熙十三年趙執信（一六六一—一七四四）纔十三歲，怎麼能聽說陳恭尹詩名二十年呢？實則趙序并非作於康熙十三年，而是作於康熙三十五（一六九六）游廣州時。二十年前的陳恭尹，名聲應該不會比葉燮更響亮的。另外，葉燮即便受屈大均影響，也不用等到康熙二十三年，他早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就可能在紹興宋琬幕府中見過來訪的屈大均了（參看本書附錄葉燮簡譜），而且《汪文摘謬》評《送屈介子序》曾詰問：「今之若程、若鄭、若梁、若屈諸子，其賢有能如白沙等諸先生否耶？」則他對粵東三子的評價大略可知。以年近花甲的他會全盤接受諸人的觀念，改易自己的思想，

恐怕是說不過去的。總之，將《原詩》的基本觀念歸結於嶺南三家的影響，我覺得還需要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不能僅憑觀念的相近作定讞，因而順便在此論及，以就正於周、董兩位及廣大讀者。無論如何，董著所作的對比是有意義的，起碼可以讓我們知道，葉燮的想法有哪些是詩壇共識，是當時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本書箋證的部分所要做的正是同樣的工作。

三

葉燮《原詩》一向被研究者視為古代詩話中最有系統、理論色彩最濃厚的著作。究其所以，則端在於其體裁異於一般詩話，是《四庫全書總目》所謂的「作論之體」。《原詩》的「原」，也就是韓愈《原道》、《原性》、《原人》的「原」。宇文所安注意到《外篇下》將詩道之不能常振，歸結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說「只有把這句話放到傳統中國文學理論的語境之中，你纔能體會到它有多麼大膽驚人。批評家經常希望借助前人一些清規戒律和不同凡響的觀點來引導藝術的發展，以恢復它往日的榮光；確實有不少人譴責其對手的觀點走錯了方向，以致把詩歌引入歧途，但沒有人把這個罪

責算在前人概念混亂的賬上」^[1]。雖然這裏將「雜而無章，紛而不一」直接與概念混亂聯繫起來，似還值得推敲，但葉燮不滿於古來文學批評的零碎而缺乏條理，則是顯而易見的。《原詩》所以採取「作論之體」來闡述自己的詩學，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

《原詩》沒有採取普通的議論文體裁，而是選擇對話的形式來闡釋自己的學說，也可能出於日常講學的習慣和積累，它明顯的優勢在於可以自如地引出各種議題，特別是集中探討詩學的基本觀念、基本概念、詩歌史原理等基礎問題，透過紛繁的現象反思其背後的原理，從而將這些問題的思考上升到美學的層面。同時，針對晚明以來詩歌觀念淆亂多變、盲目無主的現實，通過設問和論辯揭示問題的實質，也有效地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和見解。這一特徵使《原詩》成爲清代，同時也是古代詩學史上理論色彩最鮮明、思辯性最突出、最具有思想體系的詩學專著。長期以來，學界一直都非常重視《原詩》的研究，日本青木正兒、德國卜松山、美國宇文所安、新加坡楊松年、臺灣吳宏一、丁履撰、廖宏昌、葛惠璋等學者都對葉燮詩學的價值提出了有啓發性的見解，

[1]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和評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五四七頁。